

戴 鴻 慈

出使九国日记

· 清末出洋考察宪政的「五大臣」之一的日记 ·





走向世界叢書

戴鴻慈
出使九国日记

陈四益 校点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戴 鸿 慈
出 使 九 国 日 记

陈 四 益 校 点

责任编辑：钟叔河

装帧设计：易 地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63,000 印张：8.625 印数：1—19,500

统一书号：11109·200 定价：0.94元



上图：戴鸿慈像（封面图片：
罗马圣彼得庙外景（见本书第
十一卷））

| | |
|---|---|
| 目 | 录 |
|---|---|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总序..... 1

• 文与其人 •

“五大臣出洋”之一幕

——戴鸿慈的《出使九国日记》.....陈四益 • 5

出使九国日记戴鸿慈 • 21

 谕 旨.....21

 序.....23

 例 言.....26

 各国考察政治大事略表.....27

 卷 一（出京至上海）.....39

 卷 二（经日本及檀香山）.....48

 卷 三（美国旧金山至华盛顿）.....68

 卷 四（美国纽约、费城、波士顿等地）.....87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卷 五 (英国、法国) | 106 |
| 卷 六 (德国柏林) | 119 |
| 卷 七 (德国外地) | 142 |
| 卷 八 (丹麦、瑞典、挪威) | 175 |
| 卷 九 (德国南部及奥匈国) | 203 |
| 卷 十 (俄、荷、比、瑞士) | 220 |
| 卷十一 (义大利国) | 238 |
| 卷十二 (海行归国) | 259 |

• 图片 •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罗马圣彼得庙外景 | (封面) |
| 戴鸿慈像 | (扉页) |
| 戴鸿慈、端方及随员 | (插页) |
| 原本扉页 | (插页) |
| 戴鸿慈和端方合影 | (插页) |

总 序

人们常说，今日之世界，是一个“迅速缩小的世界”（rapidly shrinking world）。在电视卫星、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，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，确实好象越来越短；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，也确实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。

可是，只要回头一看，就可以看到，仅仅在几代人以前，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。古代欧洲人说，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，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，就从里面取出丝来（见Pausanias《希腊纪事》）。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，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，脐带还连着大地（见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及《康熙御制渊鉴类函·边塞部九》）。这类海外奇谈，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；而在过去上千年中，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，记载在享有权威的史书上。由此可见，人类文明的发展，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。

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，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。人类文明史象叙述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，将永远铭记着张骞、玄奘、鉴真、郑和和马可波罗、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：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，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。

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。当黄河、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，泰晤士、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，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。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，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。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，中国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。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。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，林则徐首当其冲；是他首先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，距离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。

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，在“严夷夏之大防”的封闭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。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？顽固派的办法是学传说中的鸵鸟。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，见了“洋人”就“以扇蔽面”。庚子年问他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“杀尽洋人”，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，自己的老命却送掉了。林则徐、魏源等则不同，提出要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就是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，来对付外国的侵略。要学习，先得了解。于是林则徐编了《四洲志》，魏源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，书的材料靠

间接采辑而来，难免有许多谬误。但无论如何，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，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。

在林、魏之后，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过去闭锁的国门，到欧美日本去学习、访问和工作。容闳一八四七年留学美国、斌椿、张德彝等一八六六年游历欧洲，志刚、孙家谷一八六八年出使泰西，这算是最早的。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，但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(现)代的科学文化、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，也就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。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专收一八四〇——一九一一期间访问欧美日本的中国人的记述。毛泽东说：“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”丛书所收虽不全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，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，都有它文化的趣味和历史的价值。

必须指出的一点是：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，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，值得中国人学习，但资本主义的本质，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。中国人走向世界、接触西方，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，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，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。对于某些作品中偶或流露的这类观点，各书卷首“文与其人”的评论文章中，将试着作些分析，供读者参考。

“洋为中用”是我们今天的主张，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不也是“洋为中用”吗？当然，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，人们慢慢地看出：仅仅学一点“长技”，搞一点坚船利炮，还是不行的。要救国，只有维新；维新行不通，就只有革命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，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，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。历史无情亦有情，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，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，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。

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但是，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，我们的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还需要不断发展、提高，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、走向世界。打开眼界以后，还要学会分析，分清好的和坏的。一切好的东西，要“拿来”为我所用；一切有害的东西，要实行抵制和预防。在这方面，前人的经验和教训，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。

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，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、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。希望它能在我国向世界开放，同时世界也向中国开放的伟大进程中，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。是为序。

编者

“五大臣出洋”之一幕

——戴鸿慈的《出使九国日记》

· 陈四益 ·

“在东欧和亚洲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一九〇五年开始的。”（列宁：《论民族自决权》）这一年，中国有两件事情十分引人注目。一件是在孙中山领导下，兴中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了“中国同盟会”。另一件便是清政府特简亲贵大臣到欧美考察政治，即所谓“五大臣出洋”。

“五大臣出洋”这件事，就清廷本意，不过是为了应付蓬勃兴起的立宪要求而采取的一种政治姿态，但结果却引

出了朝廷内的一场争论，进而激化了全国的政治局势，直到革命军起，皇帝退位，才算有个了局。

戴鸿慈是出洋的“五大臣”之一。他和端方负责考察美、德、俄、意等国，一共访问了九个国家。这部《出使九国日记》(以下简称《日记》)，就是他此行的实录。

演出这一幕的背景

一八九八年(戊戌)，资产阶级维新派受到严厉镇压，要求改革的潮流曾一度低落。那时候，“朝野上下，咸仰承风旨，于西政西学，不敢有一字之涉及。”(《论中国必革政治始能维新》，见《东方杂志》第一年第一号。)但封建专制政体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的矛盾是如此尖锐，任何反动高压，尽管能使公开的政治运动敛迹于一时，却不可能使人民争取民主革新的根本要求消匿于永久。于是，“革新之机遏绝于上而萌发于下，有志之士翻译欧美及日本政治之书籍、研究其宪法者渐众”(《立宪运动之进行》，见《东方杂志》第九卷第七号)。资产阶级立宪派应运而登上了政治舞台。

《辛丑条约》连本带息九亿八千余万两白银的赔款，全部落在中国人民的头上。苛捐杂税不但使社会经济更形凋敝，人民生计愈益艰难，而且对发展中的中国资产阶级也是沉重的打击。封建统治集团的骄奢淫佚却有增无已，西太后回到北京之后，大修颐和园，穷极奢丽，日费四万两，歌舞无休日。而且，对外国人更加俯首帖耳，“量中华之物

力，结与国之欢心”；“凡外人有所要求，无不曲意徇之”。

这样一个政府，应不应该继续存在？这样一种政体，要不要加以改革？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人，都在认真思索。要求立宪的呼声，一开始就深深打动了人心。这时的清政府，“既内恐舆情之反侧，又外惧强邻之责言”（《论中国必革政治始能维新》）。为了缓和一下矛盾，统治集团不得不违心地捡起“维新变法”这个他们曾经誓死反对过的口号。一九〇一年，慈禧假惺惺下诏“变法”，并特设督办政务处，作为综理“新政”的机关。

所谓“新政”，不过是调整官制、整顿吏治、改定刑律、满汉通婚、废除科举、劝止缠足、奖励实业、选派留学生这样一些事，根本没有涉及国体和政体的问题。但即使是这些枝枝节节的“新政”，也多系空头支票。拿一九〇三年的开经济特科来说吧，这是作为“废除科举，选拔人才”的一项“新政”来办的。结果考取一等第一的梁士诒，因为姓名是“梁（启超）头康（有为字祖诒）尾”，就不得重用；第二名杨度，也因在试卷中谈新学过多，遭到疑忌。这样的“新政”，正象陈天华在《警世钟》里所指出的：“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”罢了。但想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，又怎能做得到呢？

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，日本战胜了沙俄。在许多中国人眼里，这便成了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的铁证。工商界、教育界一倡百和，群言立宪，把它作为救亡图存的有效途径。“昔者，维新二字，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；今者，立宪

二字，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”。（《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》，《南方报》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一日）另一方面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日趋活跃。一九〇五年，同盟会正式成立，确定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革命宗旨。同戴鸿慈一道出洋考察政治的端方，在一份密摺中惊呼：“孙文演说，环听辄以数千；革命党报发行，购阅数逾数万，……人心之变，至是而极。”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夹击下，照原样确实混不下去了。

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觉得，与其被人革命，毋宁接受立宪。端方在上述密摺中说得十分明白：“今日欲杜绝乱源，唯有解散乱党；欲解散乱党，则唯有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。”所谓“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”，即是要朝廷同意立宪，使广大人民不要都奔到革命的大旗下。当时看到这一着棋的，不仅是一个端方。在一九〇五年前后，先是驻法公使孙宝琦上本建议“仿英、德、日本之制，定为立宪政体之国，先行宣布中外，予以固结民心，保存邦本”。他说，若不如此，“外侮日逼，民心惊惧相顾，自铤而走险，危机一发，恐非宗社之福”。随后，云贵总督丁振铎、两广总督岑春煊、江督周馥、鄂督张之洞等也相率以立宪入奏。后来，最会见风使舵的直隶总督袁世凯，也奏请简派亲贵大臣，分赴各国考察政治，以为改政张本。所谓“五大臣出洋”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演出的一幕。

择？而从

光绪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六月十四日，清廷发出派五大臣出洋的谕旨说：

方今时局艰难，百端待理。朝廷屡下明诏，力图变法，锐意振兴。数年以来，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，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，未能洞达原委。似此因循敷衍，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？兹特简载泽、戴鸿慈、徐世昌、端方等，随带人员，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，以期择善而从。……

这道谕旨把国家衰弱颠危的责任，一古脑推在“承办人员”头上，当然是极不公道的。但有什么办法呢？“臣罪当诛，天王圣明”一直是专制政治的天经地义啊！不过这回“圣明”总算承认，只有“变法”，才能“振兴”了。

所谓变法，就是要变动“祖宗成法”，也就是要变动封建专制政体的根本大法，改行“东西洋各国”（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）的新法，也就是所谓“择善而从”。

两宫（太后、皇上）要“择善而从”了！谕旨一下，立宪派的人确实高兴过一阵子。代表资产阶级的《时报》发表文章说，“人人意中皆若有大希望之在前，以为年月之间，必将有大改革以随其后。人心思奋，则气象一新”。《东方杂志》也发表文章道：“盛哉此举！其我国自立之权舆，吾人莫大之幸福欤！”

革命派的人则相反。他们说：“择善而从”是假的，是“假考察政治之名，以掩天下人之耳目”，是清廷“将变易

其面目，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，因以食人者也”。（《怪哉！上海各学堂、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》，见《民报》第一号。）因此，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奉旨出洋，于北京前门登车之际，革命党人吴樾去抛了一颗炸弹“送行”。载泽、徐世昌、绍英俱被炸伤，吴樾本人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吴樾的一颗炸弹，使“五大臣出洋”这一幕更富于戏剧色彩。到了九月，清廷惊魂甫定，改派李盛铎、尚其亨顶了徐世昌与绍英的缺，仍旧凑足了五大臣之数，分路出洋。经过这一番折腾，人们脑中不免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：究竟要择？而从呢？

被“特简”出洋的五大臣，与清廷的关系虽有亲疏之分（载泽是近支王公；端方是满人；戴鸿慈则不过是一个汉籍侍郎，在考察中才升任尚书），但都是清廷的臣仆。他们的身份不是在野而是在朝，并不是什么维新派，也算不上立宪派。然而，在当时一班满汉大臣中，这几个人并不那么颀顽，也不算特别顽固。他们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考察班子，另外还联系了一批社会人士，其中包括了伍光建、杨度这些真正讲维新、想变法的人物。出国以后，五大臣亲自接触了西方立宪国家的实际，加上新派人物的推动、影响，他们在陆续提出的考察报告中，还是讲了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话，比如说：

“日本维新以来，一切政治取法欧洲，……………公议共之臣民，政柄操之君上；……虽其兴革诸政，未必全无流弊。然以三岛之地，经营二三十年，遂至抗衡列强，实亦

未可轻量。”

“美以工商立国，纯任民权。……要其驯致富强，实非无故，藉资取镜，所益甚多。”

“……英国政治，立法操之议会，行政责之大臣，宪典掌之司法，君主裁成于上以总核之。其兴革诸政，大都由上下两议院议妥，而后经枢密院呈于君主签押施行。故一事之兴，必经众人之讨论，无虑耳目之不周。……百官承流于下，而有集思广益之休；君主垂拱于上，而有暇豫优游之乐”。

“法兰西为欧洲民主之国。……其设官分职，则三权互相维系，无轻重偏倚之嫌；其地方自治，则都府秉成中枢，有指臂相联之势。……自大败于德以还，凋丧之余，不三十年，复臻强盛。其作民气以培国力，实根于政治之原理，良非倖致。”

五大臣对于美、法等共和国，虽说中国之政体与它们“不能强同”，但也强调它们“纯任民权”、“三权互相维系”的政体是富强的根本，“藉资取镜，所益实多”。对于日、德、英等君主立宪国，则毫不掩饰地肯定它们“公议共之臣民”、“朝无妨民之政”和“立法操之议会，行政责之大臣，宪典掌之司法”。他们以一片忠心，为皇太后、皇上准备了一条道路：“君主垂拱于上，而有暇豫优游之乐”。看样子，他们也觉得最好让中国保留一个“垂拱于上”的立宪元首，而不再想奉戴“乾纲独断”的专制皇帝了。

择？而从呢，五大臣就这样作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。